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要求，意义深远而宏大，不仅内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着眼于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根基的现实需要，更主动地回应全球生态挑战，致力于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以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为世界观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观核心，加之由此推出的实践方法论要求，共同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哲理框架，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次的理论支撑。

一、以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为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值得全人类借鉴和运用。在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纵容人类无限度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早先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批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科学自然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著名论断，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内涵：人类不是外在于自然的孤立存在，而是自然的内在组成部分；自然也不是人类可以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人类生命构成的前提和基础。这种观点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破坏自然就是伤害自身，毁灭生态就是终结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落的实例，雄辩地证明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必将招致生态系统的反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绝佳继承和丰富发展：不仅是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生动诠释，更将保护自然与经济发展高度统一起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取得的各项成就，是新时代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鲜活验证。

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一场深刻的全球价值观革命，带来了从“原子化个体”到“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这种“类主体”意识要求我们超越种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认识到人类利益的共同性和风险的整体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体现了对资本主义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超越，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基础。在这种新的价值取向下，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得以在新的高度上实现统一。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下，全球公共产品与共同福祉的价值得到重塑。清洁的空气、稳定的气候等生态要素，不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或某个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是关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包含了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的正义诉求，突出表现为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伦理统合。这种以共同福祉为核心的价值重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道德凝聚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坚定决心和历史担当。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和内容。

三、以系统构建全球可持续发展体系为实践路径

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与协同治理的方法论总纲。政府、企业和公民需要分别发挥“元治理”角色，关键执行者和基础性力量的作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以三大系统性变革路径全面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第一是经济体系的生态化转型。通过资源的减量化和循环再利用，实现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的根本转变，最大限度减少原生资源开采同时加强废弃物无害化处置。通过碳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引导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

第二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化重构。构建公平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维护并强化《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框架，有效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资金承诺，消除绿色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壁垒，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绿色转型。

第三是社会文化的绿色化创新。培育绿色低碳的文化理念和社会风尚，要将生态伦理、环境科学系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培育大家的星球公民意识。重塑幸福观，推动从追求物质占有到追求精神丰盈、人际关系和谐与生态体验丰富的转变，从而实现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根本超越。

全球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文明范式转型。这场转型的深度和广度要求我们必须为其构建坚实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以其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力量，为我们提供世界观的科学性奠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切的伦理关怀，为我们提供价值观的时代性重塑。在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遵循以系统思维和协同治理为总纲的实践方法论要求，一定能有效推进全球经济体系生态化、全球治理公正化、社会文化绿色化的系统性发展。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2023ZSS032]阶段性成果）

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历史定位的“三个维度”

张润

固“十四五”时期在改革攻坚、对外开放、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又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筑牢“物质技术基础、治理体系基础、安全保障基础”。这一“继往开来”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其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关键一程”地位。

二、改革任务的艰巨性：是破解科技、改革、安全、环境等系列深层次矛盾的“攻坚主战场”

从国际环境看，“十五五”时期将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深刻影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带来“弯道超车”的机遇；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国际安全形势动荡等风险挑战交织叠加。

从国内环境看，虽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释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改革仍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改革任务十分艰巨：一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决胜期”。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领域。“十五五”期间，中国必须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才能真正摆脱“卡脖子”风险，为现代化提供核心驱动力。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化期”。“十四五”提

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十五五”，这一格局需要真正畅通和稳固。这意味着要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环境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度释放内需潜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三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窗口期”。2030年前要实现碳达峰，“十五五”时期正是碳达峰前的关键五年。这意味着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都必须进行深刻而迅速的调整。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期”。面对金融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内外风险挑战，“十五五”时期需要加快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国家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发展的安全屏障。

三、发展质量的转折性：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的关键跃升期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依然存在。“十四五”时期需聚焦“质的有效提升”：在科技创新上，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在产业升级上，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区域协调上，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经济增速将不再是唯一追求，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将成为更重要的指标。人民生活水平将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富裕”和“高品质生活”。二是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需要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问题，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涉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深层次社会变革。三是治理效能获得根本性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十五五”时期的历史定位，在时间轴上是关乎2035年目标达成的“关键一程”；在任务轴上是破解深层次矛盾的“攻坚主战场”；在发展轴上是实现发展范式转变的“关键跃升期”。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定义了这一时期的极端重要性与独特历史使命。这五年的建设质量、改革深度与发展高度，将直接决定我们能否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这一定位，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勇毅前行，奋力将“十五五”蓝图转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台阶，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分中心研究员）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

燕玉叶

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通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促进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初步探索，追求财富绝对平均和同步实现富裕，遭遇了一些挫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道路。

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

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朝着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推动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目标。“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就业、分配制度、教育、社会保障、房地产、健康、人口、公共服务等领域采取系列均衡性可及性政策举措，通过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切实推动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通过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追求所有人同步共同富裕，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带动所有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价值体现。

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追求经济增长、物质丰富

的共同特征，还蕴含基于本国历史文化的民本主义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致力于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逐渐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和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追逐以“资本家”为代表的少数人利益最大化，以殖民和掠夺为主要发展手段的现代化模式有根本区别。

阶梯式递进推进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越性。“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通过系列民生工程和政策措施增 加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调动全 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分中心研究员）

数字中国建设新图景展望

章亚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建设数字中国建设。”这一系列重大战略形成联动，同步实施，彰显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极端重要性。

当下，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引擎之一的人工智能，正推动生产方式经历一场历史性革新。这一革新的趋势是传统“人+机器”的生产模式向“人+‘机器人’（AI智能体与物理机器人）”的协作共生模式演进。此种模式演进必将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巨变。

（一）人工智能驱动生产方式的转变：从“人+机器”到“人+‘机器人’”

首先，生产工具迎来颠覆性升级。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集群的出现，“人+‘机器人’”的智能时代正逐步取代“人+机器”的工业时代。以人工智能为重要引擎的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在于它实现了“拓展与增强智能”对“替代体力”的超越。在工业时代，机器的作用是延伸与放大人类的体力。然而，人工智能驱

动的生产力依托算法与数据，通过模拟、延伸人类认知能力，使得生产过程中大量程式化、可计算的脑力劳动被纳入自动化范畴。随着这一过程的逐步推进，重复性“操作劳动”的价值将会递减，而具备创造性、批判性、情感性和高度复杂性“智慧劳动”的价值将得到凸显。

其次，新型生产实践呼唤新型的劳动者。在传统模式下，人是绝对的主体，机器是纯粹的客体，二者界限分明。但在“人+‘机器人’”的新范式下，AI系统呈现出“准主体”的特征。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下达指令与执行指令的关系，而是包含沟通、理解、协作甚至相互学习等内容的“共生”关系。劳动者必须学会如何有效地向机器“表达”需求。“与机器对话”的能力，将成为未来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

再次，AI赋能教育促使人才培养转型。

其中，教育是基础。教育不能是标准化地讲授静态知识、训练单一技能，而应该是塑造能够引领、驾驭智能系统的“数字时代新主体”。人才培养的范式将由“生产一个完成体”转变成“培育一个能持续进化、自我更新的主体”。

（二）人工智能助力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外部自动化走向内核智能化

首先，在日常生活方面，以衣、食、住、行、医等基础领域为切入点，智能化正实

现与社会运转的深度融合。AI营养师、机器人护理员等技术应用，将逐步成为生活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人工智能的普及必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职业方面，跨学科整合创新能力的需求愈发突出。随着专业化、程式化的智力任务由人工智能承担，人类自身的劣势将更多地体现在跨领域知识融合、非结构化问题解决与原创性思考中。这要求打破现有学科界限，推动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与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此外，在技术迭代日益快速、产业形态持续演变的背景下，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社会对个体创新能力的要求将被推向新的高度。

再次，在个体发展方面，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将大幅增加。一方面，智能劳动本身高度依赖人的创新能力，劳动不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为个体腾出了更多空闲时间，也为其在艺术、文化等领域的才能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三）人工智能生发的智慧启迪：辩证思维方式的时代升华

首先，深化战略思维，把握发展节奏。

战略层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与此同时，要充分意识到发展

的节奏问题，仔细辨别发展阶段。例如，“十五五”时期正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其次，深化系统思维，统合多元要素。在智能时代，技术、数据、人机单元等多元要素深度交织，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生活网络。这不仅意味着宏观决策需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全局，更预示着未来每一项具体的生产劳动，都将要求劳动者具备理解、协调乃至驾驭系统的能力。

再次，深化创新思维，重估意义标的。以人工智能为重要引擎的新质生产力表明，创新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从“如何做得更好”，转向了“何为值得去做”。未来的创新者，需要审视和界定那些值得智能系统为之努力的“终极意义标的”，为技术赋予明确的人文方向与伦理边界。

从“人+机器”到“人+‘机器人’”的演进，呈现了一幅正在展开的数字中国新图景。以人工智能为重要引擎的新质生产力，正以其磅礴之力，重塑劳动范式、生活模式与认知架构，迫切要求以深化的战略思维把握其节奏，以系统的整体思维驾驭其复杂，以蓬勃的创新思维激发其活力。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